

主编◎吴雁南 冯祖贻  
Zhongguo 苏中立 郭汉民  
jindaishehuisich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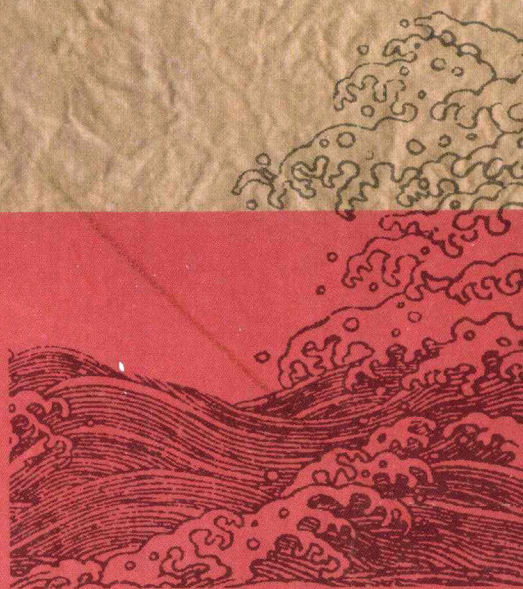
第一卷

#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1840—1949

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由于西学的东渐，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文化挑战。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成为中国历史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一中心问题，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涌现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形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近代社会思潮的云涌风发，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之积极精神的高扬，努力寻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新路。



主 编

吴雁南 冯祖贻

苏中立 郭汉民

# 中国近代 社会思潮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840 - 1849

第 一 卷

1840 - 1911

CS 湖南教育出版社

##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1840—1949)

### 第一卷

吴雁南 冯祖貽 苏中立 郭汉民 主编

责任编辑：刘新民 刘素文

责任营销：方 民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228411705@qq.com

客 户：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国防科大印刷厂印刷

710×1050 16开 印张：42.75 字数：543200

1998年8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2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55-2599-4

定价：50.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系贵州师范大学吴雁南教授主持的国家“八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课题最终成果，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本卷主编** 苏中立

**副主编** 刘 伟 徐 扬

## **本卷执笔者**

本卷导论 吴雁南

**第一编** 第一章 李志铭

第二章 彭南生

第三章 郭汉民

第四章 陈爱平

第五章 莫宏伟 黄小雷

**第二编** 第一章 郭汉民 吴志柳

第二章 冯祖贻 王 劲

第三章 郭汉民 杨代春

第四章 郑永福

**第三编** 第一章 苏中立

第二章 苏中立 张旺清

第三章 刘 伟 王 劲

第四章 谢双林 杨 安 沈志安

**第四编** 第一章 苏中立

第二章 李银波

第三章 张恒平 吴君隆

第四章 苏 晖

第五章 王玉德

第六章 王荣国

第七章 杨正喜

## 序 言

前年，吴雁南教授和我谈起，他正和许多位中国近代史专家、思想史专家合作，编写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时间跨度从晚清到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一个多世纪。时隔两年，现在这部多达4卷、200多万字的煌煌巨著，已经杀青，即将问世了。参与工作的主编和撰稿人中很多是我的老友或新交，我由衷地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鼓舞、欣喜。

从晚清以来一个多世纪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国家穷困落后，战乱频仍，外国侵略，军阀肆虐，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先进人士奋起抗争，探索救亡的道路，长期以来，这种努力一直在执著地、不懈地进行着。而反动落后之势力亦粉墨登场，旋起旋灭。伴随着派系和人物的活动，思想领域中亦波涛翻滚，急流飞溅，阴晴明晦，潮起潮落，种种“主义”和“主张”前推后拥，此起彼伏，千姿百态，目不暇接。当时的人们或者从刚刚传来中国的西方文明中寻找救国的真理，或者从尚未退出舞台的传统文化中觅取济时的药方。改良主义、立宪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名目繁多，匆促上阵，曾几何时，又仓皇退潮，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部著作中，对一个多世纪内的各种思潮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极有见地的分析，使我们了解当时中国思想界主义之繁多、思想之纷杂，正反映了苦难中的中国社会的紊乱、蒸惶、无序。但是，历史的行进有着确定的方向，先进志士的不懈探索，使中国前途上出现了希望的光辉。这就是上个世纪之交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潮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这是历史的主流，时代的强音。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先后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带领人民群众，昂首阔步地前进。

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潮的形成、传播，不仅仅是某些杰出人物的创造和引导，它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长远的历史传承。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内出现了这样多的“主义”和“主张”，偏偏只有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成为人民信奉的指针，这决非偶然。这部著作告诉我们：世纪初的三民主义和后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怎样产生？它们借鉴了什么样的先行思想？又在中国的社会实践、革命运动中吸取



了什么营养？它们何以会被 20 世纪的中国人所接收而变成人民群众行动的指针。一种思潮，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流行。它总是以一定的经济和政治为基础，反映着某个阶级某个集团的利益，代表着向上的前进的或者倒退的落后的趋势。认真辨析各种思潮的背景、渊源、性质、内容，就能正确地判断它的作用、意义和发展前途。思潮是从社会的物质生活中派生，但这一点并不妨碍思潮具有超前的引导作用，它一旦产生，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反馈力量，人们将以他们倾向或信奉的“主义”、“主张”指导当前的行动。思潮对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牵引作用。观察和研究某个社会中的主流思潮，将能预见这个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轮廓。

各种思潮的同时并存和前后相继都伴随着激烈的斗争。我们看到一个多世纪内，有革命和立宪之争，共和和复辟之争，尊孔和反孔之争，问题和主义之争，科学和玄学之争，本位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社会史、社会性质之争，等等。我们应该在这些眼花缭乱的争论中把握住观察的方向和方法，找出隐伏在这种思想斗争之下的深层内涵。在各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和长期斗争中，社会主义思潮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而热烈的认同。其原因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思潮最符合中国的国情，最适应历史之潮流，故而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时代的主导思潮。主观的思想，当它获得客观历史进程强有力的支持时，这种思想才能不胫而走，迅速发展，广泛传播。

当然，20 世纪众多的思潮和主张中并非只有对立的方面，也有着彼此呼应、相互影响的同一方面。例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如果天真地以为可以用之来避免革命，拯救国家，那当然是空想而不切合实际的。但曾经服膺这种主张的人怀抱强烈的救国爱民的愿望，切切实实为社会办了许多实事，还有不少人因他们原来主张的碰壁进而走向社会主义。这些主张中也包含了与社会主义可以相通的某些具体思想，对于一切社会思潮中所包含的积极、合理的成分，应予肯定。

人们习惯于回顾刚刚走过的艰辛路程，以总结经验，增长智慧。现在，已临近 20 世纪之末，回顾本世纪前半叶和前一世纪后半叶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思潮，探析其发生、发展及其内容、意义，辨析其精华和糟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还将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有益的推动作用。

# 绪 论

吴雁南 苏中立

## 一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内涵与特点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课题研究，以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所呈现的各种社会思潮为对象。课题研究最终成果《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一书，按社会思潮发展阶段，分作四卷：第一卷阐述晚清社会思潮（1840—1911），第二卷阐述民国前期社会思潮（1912—1919），第三卷阐述民国中期社会思潮（1920—1936），第四卷阐述民国后期社会思潮（1937—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关于近代社会思潮的内涵，时贤间有涉及，在此，亦略陈粗浅之见。

不言而喻，社会思潮是某些个人、集团、阶层、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围绕社会重大问题抒发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主张、观点、意愿的总和。一种社会思潮常常包括各种不同层面人们的思想主张、观点、意愿和心态。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论及“时代思潮”发生的条件，发展的过程，特别形象地谈及“才智之士”与“阉冗者”相与呼应、思而成潮的情景：“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阉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某一特定的思潮都经过始发（启蒙）、高涨（全盛）、蛻分、衰落等阶段：“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寢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这种思潮，不仅与社会“环境之变迁”和“心理之感召”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时代”有关联：“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凡思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sup>①</sup> 梁启

---

<sup>①</sup>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2页。



超对于“时代思潮”的这些分析，对于社会思潮也是适用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思潮，既具有理论形态，又具有心理形态，是理论形态和心理形态的统一。因为一种思想主张必须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得到传播，并在相当程度上为社会个体所接受，才能形成社会思潮；而个体接受某种思想主张，既有理性的内化，也有情感的吻合，前者需要主体的知识基础，因而只是社会中的少数人，后者只需以情感、信念作基础，往往具有自发性和普泛性。因此，社会思潮一旦形成，就不光是思想理论了，它必然渗杂着大量的情感、信念、意愿，必然是融理论形态与心理形态为一体的思想潮流。<sup>①</sup>

社会思潮不仅同社会史紧密关联，而且同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以及俗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等都有联系。但某一门学科或某一思想文化或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的潮流，并不等于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诸多社会思潮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都是围绕着政治问题而阐发并紧随政治之后而占据社会精神的中心地位的。

社会思潮与哲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直接联系是指哲学在社会文化和社会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决定了它的社会影响极其广泛，有些哲学思潮如中国近代的进化思潮，则直接演变为社会思潮。间接联系是说许多社会思潮都包含有某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运用哲学思维对社会思潮作客观的分析，可以发现每种社会思潮内部和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历史的逻辑的联系，从而更好的把握各种社会思潮的统一。

社会思潮与文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某些社会思潮借助或通过文学形式表达社会共鸣，扩大社会影响，如借助诗歌表达爱国情谊，通过散文、小说反映社会理想，通过人的文学表达妇女解放等等。中国近代在进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同时，开展了文学革命，致使某些文学思潮也成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

社会思潮与宗教的联系是值得注意的。由于近代中国的宗教既出世

---

<sup>①</sup> 参见徐永祥、贺善侃主编：《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又入世，因而与各种社会思潮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许多思想家都与基督教、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基督教和佛教的某些教义，不仅渗入一些思想家的理想社会模式之中，而且成为他们创立哲学体系的重要资源。不仅如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还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反洋教思潮与运动，佛教（佛学）的复兴则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重要一环。<sup>①</sup>

正因如此，社会思潮的研究，“它常常需要跨越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俗文化、社会生活方式诸多领域，从而反映出社会思潮自身的广度与深度。”<sup>②</sup> 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情况就比西方独立国家更复杂一些，所涉及的问题则更为广泛。早在明代中叶，中国社会内部在个别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市民阶层，同时也萌发了带近代色彩的社会思潮。<sup>③</sup> 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孙奇逢、李颙、唐甄、陈确等辈巨儒，竞相抒发己说。要求冲破儒学三纲五常的精神枷锁，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抒发民主思想，倡言“自由私产”、“工商为本”与“均田”的主张，形成思想界的巨波异彩。其核心则在于以人为本，追寻人道，把人们的思想意识从封建教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虽然，他们欲突破传统，而又囿于传统，但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在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上萌发的新思潮是可以发展为洪波巨澜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斩断了中国独立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也斩断了在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上独自发展新文化的道路。鸦片战争后，西学的涌入，在神州学界卷起阵阵革新、改造中国的思潮。尽管人们是站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抒发西方的学理的，但是，应当看到，中国近代相当一部分社会思潮，特别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如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都是在西方同类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们既同西方同类思潮有着血缘关系，也

① 以上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0页。

② 冯契：《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总序》，李向平：《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丛书总序》，第3页。

③ 参见本书第一卷导论。

有变异；它们传入中国之后，既影响中国，同时也必然要同中国的传统思想发生冲突和融合。西方文化的输入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使其具有时代特征；另一方面移植到中国的西方学理必然有个中国化的过程，使其带有民族特色。因此，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必须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不仅要研究近代中国诸多的思想文化领域以至社会领域的学问，而且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以及西方同类的社会思潮。这就大大增加了研究工作的广度和难度。

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由于西学的东渐，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文化挑战。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成为中国历史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一中心问题，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涌现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形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纷呈涌动的社会思潮中，有的处于主导地位，有的为非主导思潮，有的超前，有的滞后，有的积极作用大一些，有的消极作用大一些，有的甚至是反动的社会思潮。但是，近代社会思潮的云涌风发，就总体而言，则是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之积极精神的高扬，努力寻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的新路。这种情景，在独立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国家，在本土文化根基上独自发展新文化的人们，都是未曾遇到过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追寻人道、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实现近代化，其所遇到的阻力不仅有本国封建主义势力，而且有较本国封建势力强大得多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鹰瞵虎视，险象丛生，其艰巨性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人们深知没有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什么事也办不成，更不用说要实现像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这类史无前例的大事。因此，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运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贯到底的系人心弦的巨大思潮，是近代中国各种进步社会思潮的原动力。中国近代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有益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振兴中华的人物和思潮都应当给予适当的肯定。毫无疑问，爱国主义应当成为评价社会思潮的一个标尺。爱国主义与改造中国相结合是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觉醒的标志。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包括了把一个封闭、专制的农业社会改造成为

开放、民主的近代工业社会。近代中国 100 多年间，志士仁人先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方案，成为主导社会思潮、其改造中国的方案曾付诸实施的，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论是变法维新的社会改革方案，还是革命共和方案，都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社会主义思潮应时而起，代之成为主导社会思潮。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广泛的内容。简言之，即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近代文化建设。由此可见，评价近代社会思潮的另一标尺，即是否有利于民主化，是否有利于中国近代化进程，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

就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潮而论，总体上看，同西方国家有共同之处，但是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涌现的社会思潮，却具有它自己的特色。

1. 有如上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题歌，爱国主义成为系人心弦的最强音。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涌现的社会思潮大都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

2. 各种社会思潮的泉涌风发，形成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奇观，并带有紧迫性和某些超前现象。1840 年鸦片战争，特别是 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催促着凡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苦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那时候，在许多志士仁人的心目中，要救国，要改造中国，就必须向外国学习。他们怀着一种愤懑和急迫的心情，将其认为有用的学理和思想主张介绍到中国，供国人采择，并抒发自己的主张。在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上半叶的百余年间，各种社会思潮纷呈泉涌。本书论及的社会思潮，包括主导思潮和非主导思潮，有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思潮。具体说来主要有：哲学上从变易思想经过进化思潮转变到唯物史观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包括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包括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思潮；以及诸多领域的改良思想或思潮，如实验主义、国家主义、联省自治、乡村建设、妇女解放、社会风俗演变等等；还有一些消极、反动思潮，如尊孔复古、法西斯主义、投降主义等。它们之

所以能形成思潮，是因为它们在一定时期内带有某种吸引力，或某种迷惑性。上述这些社会思潮，派系林立，内容庞杂，流动变迁迅速。有人刚刚迈进民主共和拥护者的行列，对西学并未潜心研习，就著书立说，在宣传西学中名噪一时。不少人涉及多种学说、主义，对许多新的学说、主义尚来不及理解、消化，又得接纳新的思想、理论、学说和主义。他们对西方学理的宣传往往带有急就章的性质。一些人以为把西方行之有效的学理、制度和社会改革方案搬到中国来即可致中国于富强。在中国尚未出现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时候，洪仁玕撰著的学习西方的《资政新篇》即得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批准颁行；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刚刚在中国的地平线冒一点点头的时候，王韬等早期维新派人士就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之际，康有为、梁启超等就发动了举世瞩目的变法维新运动；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远未革命化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席卷神州大地，推翻了清朝，创建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人们在亡国灭种的威逼下，急切地向西方寻求救国之方，匆匆向前迈过了西方几百年所经历的途程。亡国灭种、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急切呐喊，催促着英雄志士尽早地登上历史舞台，各种改造中国的方案尽速展现，社会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虽然，这些人物的活动、社会改革方案、社会学说、社会运动，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中国的社会条件，而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学理、改造中国的潮流却滚滚向前，一浪推逐一浪。先进的中国人先是学欧美，后来是学习俄国，反复的革命实践，才使人们更加重视国情，注意讲求实事求是。20世纪中叶，社会思潮的这种超前色彩才逐渐减退。

但是，近代中国上层建筑变迁急速，而社会基础，即社会土壤变化较慢的事实又昭示人们，要消除这种超前意识，其艰巨性也是可想而知的。

3.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与发展，始终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同西方的独立国家有很大差异，也同其他封建国家不同。就其大端而论：（1）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富有

优秀文化遗产的大国，在世界上是很少有其他国家能够同她相比的。亿万中国民众富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2) 在这个国家的内部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结构已开始出现某种变化，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思潮早就处于萌发之中。(3) 既要拜西方为“师”，学习西方，又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把目光转到俄国，以“俄为师”，并且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这种情况虽有了根本的改变，却仍与西方国家在本土文化的根基上萌发与发展近代文化，并取代封建主义的文化有很大差别。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开始逐渐沉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用强力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漩涡，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了猛烈的冲击，中西文化开始出现了剧烈的冲突；另一方面，个别适应中国内部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而具有某种新的思想因素的思想家、政治家，即开始进一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主张学习西方的长处，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适应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大趋势。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学习西方的社会思潮。此后，学习西方的高潮迭起，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论争亦不断发生。尽管中西文化之冲突与论争相当突出，从总体上看，经过这种冲突与论争，却是走向融合。孙中山总结了晚清80年间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经验，坚持融合中西。他主张学习西方，却反对拜倒在洋人足下，“奉欧美为至上”<sup>①</sup>，鄙夷中华文化。他主张继承发扬中华文化的固有传统，却坚持批判中国的封建制，先后提出了“翻陈出新”<sup>②</sup>，“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sup>③</sup>，“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sup>④</sup>。他主张尊重民族文化，却又反对排斥西学。这种融贯中西，“创获”新文化的思想主张，应当说是正确的，但要为人们所认同，却需要一个过程。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思想文化领域极为活跃，各种社会思潮争相呈现，东西文化的论战形成

① 孙中山：《与刘成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4页。

②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9页。

③ 桑德：《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3页。

④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

高潮。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就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讨论开始，到1927年10余年间，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先后参加这场论战的达数百人。论战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场论战集中于东西文化异同优劣，新旧文化能否调和，中国采用何种文化，走什么道路等问题的争论。1920年以后论战形成高潮，一支新的文化生力军崛起于论坛，举起社会主义文明的旗帜，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sup>①</sup>毫无疑问，这场论战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时代前进的文化运动，但是，也有不足，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曾指出的：“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务，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sup>②</sup>因而也不可能站在融贯中西文化的高度。此后，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争论仍在继续，“全盘西化”、文化保守主义相竞抒发其思想主张。一批活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融合中西，创获新文化的立场，参加了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出现的中西文化的论争，是在中西文化冲突、融合过程中迭起的，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产物，反映了在社会变革中某些个人、集团、阶层、阶级在文化问题上的不同思想主张；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人们对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探索。人们力图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起初即是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的。也正是他高屋建瓴，科学地总结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关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探索的成果以及经验

① 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增订第2版，《前言》部分，第5页。

②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教训，正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文化的方向这一牵系人们心弦的大问题。他明确指出，对于外国文化，盲目搬用的方针是错误的，排外主义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要批判继承，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以利于发展民族新文化。从表面看，毛泽东同孙中山对待中外文化的观点似乎大体相同。诚然，这两位巨人在主张融合中西，要求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的思路颇有一致之处；但正如孙中山经常强调的那样，“后来居上”，毛泽东则是在孙中山及其后大批志士仁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构铸和规定了中国新文化的基本模式，那即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sup>①</sup>。有了这一规范，对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怎样创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才有一个标准，并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

由此可见，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不仅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而且其所围绕的历史中心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问题，要为人们所认同，亦须对中西文化观有个科学的认识。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思潮。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造中国，曾经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近代中国前80年间的一面旗帜。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曾先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华大地卷起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代替封建专制主义的浪潮。其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其早期亦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及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先后失败，迫使人们对历史的经验与未来发展的走向进行沉思，继续寻求中国的出路，但并不是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在人们心目中都已破产。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后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以与日俱进之势显示出其活力，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潮，但是要让具有爱国心和要求进步的人们服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因而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虽已开始逐渐处于非主导社会思潮

---

<sup>①</sup>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的地位，但有时还相当活跃，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思潮。众所周知，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在他一生最后的几年发展了自己的学说、理论和思想主张，并于1924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一系列政策；宣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对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具有新时代的特征，顺乎时代之潮流，成为联合各革命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一面旗帜。应当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相当活跃的时期。虽然，孙中山的纲领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充分肯定，他本人的思想主张也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影响，却仍旧未能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而他的思想主张更为举世所瞩目。在他逝世以后，情况就复杂得多，混沌迷离；相互矛盾的现象杂陈，如从总体上把握，则可概括为三种情况：宋庆龄等志士仁人，继承和坚持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其他革命主张，与共产党人携手合作，矢勤矢勇，夙夜匪懈，为新中国诞生奋斗不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主张，虽然还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却是利用它来文饰其反革命本质，为其专制独裁统治服务。其他的一些人在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追求祖国进步，向往民主共和，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或持保留态度，或持部分或全部反对态度。这种情况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有了很大转变。他们所持的三民主义，既跟蒋介石所谓的“三民主义”有根本区别，又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一定的差异。

抗日战争时期，中间派逐渐结合起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提出民主要求，逐渐形成第三条道路思潮。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这种思潮相当活跃，出现了“十足道地”民主共和国建国方案，表示要为实现“共和国理想”而努力。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和对民主党派们的疯狂迫害，使人们所期待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善良愿望破灭了。人们在事实和真理面前体认到，第三条路线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行不通。曾经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还相当活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直至中国新民主革命临近胜利才基本结束。